

溶解的社会经验

——论情感结构下《乡村与城市》中的城与乡

张续英

(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省南京市, 210000)

摘要: 作为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 情感结构为解析文学传统与社会变迁提供了动态视角。自提出以来, 情感结构历经流变, 从文学批评工具逐步演变为文化分析范式, 充当着连接个体经验与集体意识的方法论桥梁。威廉斯在其经典论著《乡村与城市》中以情感结构为引, 通过英国田园诗歌探究英国文学传统中的城乡关系, 一方面批判了传统城乡书写中城市进步主义与田园主义的城乡认知错位, 另一方面揭示出田园诗歌中体现的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城乡发展模式, 并将此模式拓展至帝国与殖民地的关系中, 最后, 通过解构城乡对立的固化逻辑, 城乡互动中的斗争性与拒绝分工、寻求新型合作的呼吁得到重新审视。威廉斯对情感结构的批评实践不仅突破了传统城乡叙事的局限性, 更将社会经验从固化的意识形态中“溶解”, 还原为流动的文化实践场域, 为新时代中国社会破解城乡发展命题提供了批判性启示。

关键词: 雷蒙德·威廉斯; 《乡村与城市》; 情感结构; 文化唯物主义; 城乡关系

中图分类号: G0 **文献标识码:** A

一、绪论

雷蒙德·威廉斯(1921-1988)是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英国新左派精神领袖、文学批评家与教育改革家, 被学界视为二十世纪英国最具原创性与实践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 他一生笔耕不辍, 著述等身, 其思想深刻塑造了文化研究的学科范式与批判路径。《新左派评论》前主编罗宾·布莱克布恩(Robin Blackburn)将其描述为“英语世界中最权威、最坚定、也是最有原创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

马克思主义在英法两国的差异常被视为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之争, 而威廉斯正是文化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研究: 两种范式》中, 将前者归纳为以雷蒙德·威廉斯和 E. P. 汤普森为代表的文化主义路径, 强调历史进程中主体的能动性与经验的文化实践; 后者则以路易·阿尔都塞为核心, 侧重结构的先在性。威廉斯称阿尔都塞的观点为“形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缺乏对文化动态性的把握。反之, 阿尔都塞的支持者批评威廉斯的理论因过度依赖经验而陷入“浪漫的民粹主义”漩涡。然而, 威廉斯对情感结构的阐发, 正体现了其对结构与主体矛盾的调和: 这一概念并非纯粹经验主义的静态结构, 而是通过吸收卢卡奇的总体性、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以及索绪尔的语言学方法, 赋予社会经验动态的、未完成的发展观念。从《文化与社会》到《漫长的革命》, 威廉斯通过重构“文化”概念的政治意涵, 不仅挑战了 F·R·利维斯的文化精英主义, 更以文化唯物主义为核心框架, 推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欧陆批判传统的对话融合。

威廉斯的人生轨迹与学术实践始终交织着对城乡关系的深刻关切。从青年时期求学剑桥的都市经历, 到重返威尔士乡村的暮年栖居, 丰富的城乡生活体验不仅塑造了他的生活感知, 更为其理论的发展与阐释提供实践基础。《乡村与城市》的写作可追溯至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 彼时威廉斯通过对英国乡村宅第诗歌的批判性重读, 逐渐形成对城乡文化的初步思考。1967 年威廉斯为英国广播公司撰写的系列讲稿, 从中进一步凝练了文化思想, 实现了从文学批评向文化唯物主义的过渡。在断续十余年的创作历程中, 威廉斯同步完成《为马诺德而战》等作品, 并在与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吕西安·戈德曼的对话中产生思想共振, 促使他突破英国经验主义的认知边界, 最终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确立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作为威

廉斯的代表作，1973年问世的《乡村与城市》以文化唯物主义为核心，通过对16世纪以来英国文学中城乡意象的剖析，结合个人经历与文化研究视角，系统探讨了文学、政治与历史的多重关联。威廉斯尤为注重“情感结构”的揭示，即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群体共享的情感体验与价值取向，这些隐性结构通过文学语言得以具象化，深刻映射了资本主义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的矛盾张力。其理论不仅为文化唯物主义在文学批评中的实践提供范本，所提出的城乡关系视角及情感结构分析方法，亦为解读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中的文化经验与群体心理提供了重要理论工具。

二、情感结构的提出与流变

威廉斯在于1954年与迈克尔·奥罗姆合著《电影导言》中首次提出情感结构，用以指涉特定时代群体对现实的潜在感知。他认为，电影作为新兴艺术形式需通过艺术家与观众共享的情感结构实现经验传递。这种结构根植于生活实践，凝聚特定群体的价值观念与生活经验，是隐匿于文学艺术整体经验中的动态存在，既无法被简单拆解，也难以通过外部符号直接指认。后来，在《文化与社会》（1958）中，威廉斯通过分析19世纪工业小说，深化了情感结构的理论内涵，一个时期的情感结构多体现于官方意识与民众实际体验发生冲突的领域。他指出，狄更斯等现实主义作家揭示了工业革命时期中产阶级价值观与现实经验的矛盾：既批判资本主义的压迫性，又因恐惧社会动荡而回避变革行动。这种矛盾心态折射出时代特有的情感结构，即人道关怀与保守妥协并存，最终以文学叙事替代实践抗争，成为一代人对工业主义困境的复杂回应。1961年，威廉斯不再将情感结构局限于文学批评领域，而是在《漫长的革命》中延伸至社会历史层面，强调其动态性与未完成性。他认为，社会经验如同溶解状态，“我们把每一种因素都当作一种沉淀物来认识，但在它那个时代的活生生的经验中，每种要素都是溶解的，是一个复杂整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理解特定时代的文化不能依赖静态记录，而需处理社会历史变化中那些悬而未决的动态元素。比起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强调，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观更看重社会文化，正是情感结构的变化导致着文化变革，情感结构“就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它是一般组织中所有因素带来的特殊的、活的结果”。威廉斯的文化观强调，对某一时代的文化认知若仅依赖文化史的书写，必然逃离不了意识形态的筛选，唯有关注当时人们的对日常生活的真实经验和普遍感受，才能揭示其真实面貌。

那么威廉斯为何选用情感结构这一表达呢？在《戏剧：从易卜生到布莱希特》（1968）中，威廉斯通过对现代戏剧的历时性考察提出，情感结构这一概念看似由“情感”与“结构”这对矛盾范畴拼合而成，实则指向文化实践中经验与形式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结构”强调社会关系的稳定性与系统性，暗示情感结构具有可辨识的意识形态框架；另一方面，“情感”则凸显其生成于个体经验中未难以把握的流动感知。因此情感结构在某个时代是稳定且明确的，但根植于人们不稳定的经验。比如，易卜生的自然主义戏剧折射出工业化社会中传统价值与现代理性的断裂，而剧中人物进退维谷的困境，恰恰映射了19世纪末欧洲中产阶级共享的情感结构——既渴望挣脱封建束缚，又对新兴资本主义秩序充满焦虑，娜拉的推门而出是对社会结构的抵制与个人情感的爆发。威廉斯借此说明，情感结构之所以稳定且明确，因其始终与特定历史阶段的权力关系绑定，而其根植于不稳定经验，则因个体的情感实践不断挑战结构的边界。后来，在1971年的《文学与社会学：纪念吕西安·戈德曼》一文中，威廉斯反驳了戈德曼与卢卡契文学难以表达社会现实的观点，他认为文学并非孤立于社会现实，而是通过创作者与接受者的经验互动，实现对日常生活的动态重塑。

威廉斯最终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77）中系统阐明了情感结构的内涵，将其定义为溶解状态的、悬而未决的社会经验，区别于已固化的文化形式。相较于早期强调其难以把握的模糊性，此处更突出其尚未定型的变化属性——指向萌芽中的关系、价值与行动模式，是文化整体转型的潜在动力。正如《乡村与城市》中威廉斯所言：“我们在这样一个体系中生活得久了，就很容易把它错当成一种必要的、实际的现实……这些经历并非唯一的，因

为在压力和局限之下的人们会做出别的安排，发展出别的情感联系，并试着按照别的价值观生活”。他坚持使用“情感结构”而非“经验结构”，因后者仅指向历史沉淀的既定经验，而前者通过“情感”与“结构”的张力，既包含现实的流动性，又暗示其可能固化为新意识形态的趋向。这一修正使情感结构兼具流动性与批判性，成为解析文化变迁的核心工具。

三、城市进步主义抑或田园主义？——城与乡的认知错位

威廉斯在《新左派评论》访谈中明确指出，《乡村与城市》的创作源于“是对某种特定文学正统的强烈回应”。尽管学界对如何阐释英国田园诗传统已有诸多讨论，但威廉斯独到地发现：那些看似纯属文学范畴的探讨，实则根植于特定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框架。通过分析田园诗文本背后潜藏的权力话语，威廉斯揭示了文学批评与社会批判之间深刻的内在关联。作为世界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先行者，英国在其以田园诗为代表的文学传统中却始终涌动着强烈的乡村情结。自赫西俄德与维吉尔的古典时代以来，对消逝的田园牧歌、传统伦理以及旧英格兰的集体追忆，构成了跨越数个世纪的英国文学热点。他在《乡村与城市》创作之初对英国乡村宅邸诗歌的研究中亦然对此有所发现：“对于乡村，人们形成了这样的观念，认为那是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宁静、纯洁、纯真的美德。对于城市，人们认为那是代表成就的中心：智力、交流、知识。强烈的负面联想也产生了：说起城市，则认为那是吵闹、俗气而又充满野心家的地方；说起乡村，就认为那是落后、愚昧且处处受到限制的地方”。可以将城乡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总结为“城市进步主义”与“田园主义”的对抗。前者将城市化进程包装为不可逆转的文明进化论，通过现代性叙事遮蔽工业资本对乡村的掠夺；后者则通过建构宁静美好的乡村乌托邦，将英格兰庄园升华为永恒的道德高地。这种城乡对立的思维模式由来已久，知识分子自古典时期便将道德理想投射于象征“宁静、纯洁与质朴美德”的乡村空间，构建起以“黄金年代里快乐的伊甸园”、“过去的好日子”、“快乐的英格兰”为代表的集体乡愁。

在探讨英国乡村时，利维斯在《文化与环境》（1964）中感慨：“旧英格兰的‘有机共同体’消失了”。过去人们沉浸于对乡村的怀旧情感结构，认定旧英格兰存在自然有序的乡村共同体，即利维斯所言的“有机共同体”。但本质上，这种情感结构是为区别城市共同体而建立的。人们既想追随城市的财富与前卫，又因城市生活的焦虑浮躁、华而不实而忧虑，最终只能缅怀并美化过去，构建出一个存在于过去的、理想化的乌托邦乡村。威廉斯对“有机共同体”这一情感结构提出批判。在威廉斯看来，英国乡村文学中的“有机共同体”并非客观存在，而是作家学者的臆想，是被塑造的“滑动的能指”。其一，利维斯推崇的小规模农业在英国圈地运动前后便消失于工业化生产中，乡村共同体内部存在压迫与被压迫的阶级关系，人际并非和谐，劳动对底层贫苦农民仍具剥削性。其二，这种共同体体现精英主义文化理念。利维斯缅怀的“有机共同体”仅仅是“少数人文化”，强调此文化仅被接受精英文化教育的少数人理解。威廉斯则相反，他反对将文化发展希望寄托于过去的复古倾向，更反对依赖少数人，人民大众才应是文化发展的中坚力量。归根结底，利维斯寄予希望的“有机共同体”是美化乡村阶级矛盾，掩盖真实乡村文化的表现。

与此同时，威廉斯开始质疑对田园生活的“追溯”源头到底在何处？对此，威廉斯将学者们对时间的认定视为向前移动的“自动扶梯”，斯图尔特将英格兰农村消失的时间追溯到1861年后的圈地运动和1900年后的住房解决方案，而科贝特缅怀的是18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个更遥远、更快乐的英格兰乡村童年，托马斯·莫尔则在1515年于《乌托邦》中追忆更早的过去，朗格兰笔下农夫皮尔斯虽处于被缅怀的中世纪有机社会，却仍在怀念过去的乡村，以此类推，“自动扶梯”将人们带到西方人类伊始之地伊甸园。“当我们在时间上向回运动，不断朝着一个更早、更快乐的乡村英国追溯时，我们将无法找到一个地方或一个时间阶段，能够让我们真正停下来”，但至少可以确定，学者们怀念的往往是自己的童年，是个别的、具体的，带有个人情感意识的时光，如无尽回退的浪潮。对此，威廉斯强调视角问题，这种视角建构机制决定了学者作为“见证人”的叙事策略：在错综复杂的现实面前，他们往

往依据特定情感结构进行对过去的定义，“我们将会看到被这些回顾所支撑的依次出现的批评阶段：宗教的、人文的、政治的、文化的”。每个阶段都有值得考察分析的不同关注点，共同将我们引向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资本主义生产对乡村田园的影响。为了分析能够解答“重大的中心问题”——即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生产和生活危机背后的情感结构，威廉斯转向了英国田园诗歌研究。

四、田园诗歌的背后——城与乡的藕断丝连

威廉斯进而对田园诗展开历史性溯源，揭示其背后隐含的从古典时期到现代社会的情感结构变迁。乡村在历史中积淀出强大文化传统，常与宁静和谐、美好自然、悠然生活相关联。且在文学领域表现突出，文学对乡村田园的追忆与描绘，勾勒出乌托邦式的乡村文化空间。威廉斯指出，这种文化空间的再现可溯源至欧洲古典主义田园诗创造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中的田园以乡村劳作、自然、物候、社群等为素材，歌颂美好淳朴的田园精神。赫西俄德至维吉尔的古典田园诗传统始终保持着与真实乡村生活的辩证张力。维吉尔的牧歌中，“乡村定居的乐趣”与“丧失土地以及遭受驱逐的威胁”形成尖锐对照，古典田园诗中“总是存在和其他经验之间的一种张力：夏季和冬季之间；乐趣和损失之间；收获和劳作之间……”，田园既是栖居之所，亦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生存场域。

与古典田园诗不同的是，文艺复兴以后的新田园诗将乡村的阴暗面刻意隐匿，田园生活变成“地方化的梦”。威廉斯称其如同穿上了“宫廷游戏的戏服”。现实中的农民苦难深重，可在文化再现中，战乱、饥荒、地租等压迫性因素被遮蔽，自然风景、丰收、人际和谐等美好被放大，营造出和美幸福的乡村图景。本·琼森在《致潘舍斯特》（1616）中，用对比手法歌颂庄园主宅邸的纯粹与简朴：“现在，潘舍斯特，当那些想要使你同/其他大厦相称的人，看到/他们除了傲慢、矫饰的堆堆土石外，别无他物/就会说，它们的主人修建了它们，而你的主人却是为了居住”，但现实是“傲慢、贪婪和算计的力量在地主们中间和城市商人中间一样，显然非常活跃”。琼森将田园诗变成对封建统治者的赞美，使乡村文化从真实走向虚假再现。“如果欢乐没有时限，岁月也没有需求，新田园诗的魅力将使人们相信这一点”。这种美化书写通过文学的美化将阶级剥削转化为和谐风景，进而巩固土地贵族的意识形态霸权。另外，新田园诗并非只为地主阶级服务，无产阶级亦有所取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表无地少地农民的掘地派以及后续土地宪章运动者，秉持对黄金时代的想象，从怀旧中诉求变革。可见，人造田园诗在呈现一种基于快乐往昔和纯真等概念的情感结构的背后，其实是反映着不同阶级的利益诉求。因此，无论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还是为无产阶级的反抗发声，诗人所创作的田园诗是与其所支持的阶级合作的结果。

人造田园诗中体现的怀旧等情感结构不仅映射着阶级诉求，更揭示出英国乡村与城市在资本主义到来后藕断丝连的紧密联系。虽然之前审视的人造田园诗并未进行历史回溯，但我们可以发现诗人对封建及后封建时代价值观念的美化：“对一种以固定的、互惠的社会和经济关系为基础的秩序的美化。于是，这些诗歌就和一个时期的时间上发生巧合，在该时期中，另一种秩序——资本主义农业秩序——正在被成功地开创出来”。资本主义秩序自19世纪起便彻底改变了传统乡村的社会经济形态。霍布斯鲍姆曾尖锐指出，此时的土地关系已呈现鲜明特征：“相当一部分具有商业头脑的地主几乎已经取得了对土地的垄断地位，这些土地由农场主人雇佣无地或者小土地持有者来耕作”。曾经以封建依附关系为纽带的农村共同体逐步演变为服务于工业革命的原料仓库，乡村不仅需要高效产出粮食以喂养膨胀的工业人口，更要通过剥离农民与土地的传统联系，将大量劳动力推入城市工厂，同时将农业剩余价值转化为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因此，19世纪英国田园作品中充斥着“花朵与特权、工厂的浓烟和民主”的矛盾意象。这种转型标志着英国乡村彻底褪去田园牧歌的幻象，转而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资本主义影响下，城乡关系由过去的彼此依存逐步变为统治与被统治的不对等关系，19世纪英国新工业体系的迅猛发展遮蔽了旧有的生活方式。英国乡村在工业发展、金融波动以及贸易危机等方面承受着冲击并付出代价，“乡村中

劳工和穷人的遭际同漫长的剥削和屈辱史上的任何情形一样糟糕”，乡村同时变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推动者和受害者。乡村的负担与苦难被田园诗人隐匿于怀旧的情感结构中，暴露出以诗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逃避。归根结底，田园主义的虚伪外壳下包裹着城市进步主义这一核心，两者并非泾渭分明。

随着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牺牲乡村以供养城市的英国内部发展模式逐渐推移至世界领域，此时的英国乡村与城市关系映射着帝国与殖民地关系。威廉斯在“新都市”一章中将发达国家描述为“大都市的”（metropolitan，亦可译为“宗主国的”），其“先进的”、“发达的”特点属于欧美国家，相反，“欠发达的”、“欠工业化的”则为以第三世界为代表的“其他社会”，“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导模式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扩张”的背后逻辑即为城乡的复杂关系。少数族裔流散全球与英国圈地运动农民涌入城市，皆为被迫的社会变迁，前者因土地被侵占、民族冲突，无奈背井离乡；后者因土地被圈占、农业变革，不得不涌入陌生城市。二者均改变了群体原有的生活轨迹，在新环境中艰难求生，成为特定历史进程下弱势群体命运转折的写照。日不落帝国统治下的印度逐步失去其本土语言和文化，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财富源源不断输入英国本土，在撒切尔夫人的“乡村遗产”计划下复兴着被城市进步主义消耗殆尽的乡村庄园景观。大都市的发展模式下，“曾经发生在英格兰的一切就不断发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发生于所有工业化国家和所有其他‘欠发达’，但在经济上却很重要的地方之间相互依存的新关系当中”。

五、延续对立抑或走向合作？——再论城与乡的现在与未来

既然怀旧的情感结构将真实城乡关系的模糊化，一切都经过了行为主体的理想化筛选，真实的乡村田园早已在资本主义城市发展中千疮百孔，那么美好田园就这样永远存留在个人的追忆中了吗？城乡命运一定在发展中互斥吗？当代社会又如何弥合工业发展中城乡间的鸿沟呢？威廉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文化唯物主义的呼吁为当下与未来边缘化的乡村提供一种城乡联结思考。在从马克思主义者到历史唯物主义者或文化唯物主义者转变中，威廉斯用情感结构架构起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经济结构与上层建筑的桥梁。威廉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反思集中体现于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命题的扬弃。他拒绝将文化现象简化为经济活动的机械反映，认为这种单向的决定论忽视了文化实践的自主性与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文化的阐释……服从一种僵硬的方法论。……因为，即使经济因素是决定因素，它决定的是整个生活方式，而文学与整个生活方式则不单与经济制度有联系”。

但文化唯物主义的初衷并不在于否认经济决定论、背离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反对抽取某一社会领域进行分析的优先性，在经济进程之外还有其他诸多进程；无意否定经济实践在社会进程中的重要性，而是质疑单向且排他的最终决定模式。威廉斯对马克思主义中的“决定论”概念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决定”的原初语义既包含“设定边界或限度”，又包含施加作用力的两者相互作用的维度，但在理论演化中逐渐被简化为抽象化的外部规律，似乎是某种先验力量对历史进程进行着绝对支配。这种决定论不仅消解了社会主体的能动性，更使理论丧失了对动态社会实践的解释力。真正的决定过程是内嵌于具体历史情境中主客体持续互动的复杂网络中，这种对“经济决定论”的反思既保留了决定概念的批判价值，又避免了机械决定论的僵局。同样，威廉斯还对“反映论”展开深度思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根源在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机械二分法。文化艺术在反映中变得被动，而创作活动也沦为对既定社会结构的机械复制，文化艺术的动态性被消解。对此，威廉斯尝试用“情感结构”作为新的理论支点，该概念消融了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传统区隔，将艺术活动重新锚定在动态的、生产性的社会实践网络之中，实现了对反映论决定论与中介论二元性的双重超越。

因此，在《文化是平常的》（1958）中，威廉斯提出：“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这一立场既保留了历史唯物主义对物质条件的关注，又将文化从被动的地位中解放出来，赋予其塑造社会关系的能动性。而“情感结构”恰好映射出某一特定时期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普遍的、动态的感受，捕捉并凝聚生活中流动的经验，将碎片化的、尚未被制度化的社会感受转化为

可被集体感知的意义框架。《乡村与城市》中描绘的乡村必然向城市演进，而城市则代表终极文明形态的线性发展模式与马克思主义下对资本主义城市化的解读密切相关。恩格斯将现代城市视为资本扩张的必然产物，《共产党宣言》中隐含的“文明等级论”更将工业化视为历史进步的新路径。但这一观点合理化了经济发展对农村、殖民地乃至自然生态的剥削。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中警示道：“赋予城市和工业以绝对优先权，以及赋予发达和文明国家相应优先权的真正过程的实行不仅会伤害‘愚昧的农村人’和‘未开化和半开化的’殖民地人民，还会最终伤害城市无产阶级自身以及发达和文明的社会”。他呼吁摒弃非此即彼的城乡二元对立和有你无我的线性发展模式，转而关注二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压力和环境污染等方面面临的共同困境，从整体中看待城乡矛盾，从普罗大众流动的经验中发展文化。

对于城乡关系的未来走向，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中的态度是“只有拒绝被划分，我们才能够克服这种分裂”。早期传统乡村共同体中，劳动与自然节律、社群互助紧密交织，形成以土地依恋和协作为核心的情感结构，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入侵，这一情感结构在流动的经验中转变。“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分裂和对立在现代有了新的形式，他们是劳动分工和专门化发展的顶点”，还导致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裂、管理和操作的分裂、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分裂”，因此，威廉斯呼吁拒绝分工，实现“新形式合作”，从“区域和投资计划到有关劳动、教育和社群的许许多多程序”。城乡协作需打破单向发展模式，将乡村的资源与城市的技术有机结合，可以说这种合作不仅是经济发展模式的重组，更是情感结构的重建。

《乡村与城市》唯一的缺陷就是对于“拒绝分工”的具体路径，威廉斯并未在最后点明，但其对城乡关系的重构和思考为当代中国的城乡关系提供了深刻启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矛盾一直是时代痛点，对此，我们也在试错过程中一步步纠错。早期发展阶段的经济腾飞以牺牲绿水青山为代价，城乡资源分配不合理导致乡村容不下年轻人，更多乡村成为老人和儿童的留守地，春运成为中国独属的人口流动大潮，以上乡村现状带来的不仅是环境恶化、农田退化等环境问题，还有流动人口和留守人口的情感危机，即“家乡留不住肉身，他乡留不住灵魂”的怀乡病以及日夜盼归的孤独感。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描写的商州山地，均有田园乌托邦色彩，这何尝不是当代中国城乡人的情感结构？何尝不是独属于中国的人造田园诗？威廉斯的理论启示在于，必须超越对城乡的固化想象，将其视为情感互构的实践场域。中国当下的乡村振兴若仅追求基础设施城市化或城市产业转移，将陷入“决定论”和“反映论”的弊端中。或许真正出路在于威廉斯倡导的“新形式合作”，在溶解的社会经验中把握文化的力量，例如，通过数字化技术将乡村传统工艺进行现代转化，使农民成为文化生产的主体而非客体；或通过生态农业、绿色工业等打破固定的城乡分工，重新连接城乡两地的土地与社群。即使本书译序中译者认为“城市无法拯救乡村，乡村也拯救不了城市，”两者之间的斗争性是普遍存在的，但我们可以借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矛盾地看待两者，积极培育基于共同经验的情感结构，使城乡真正成为意义的矛盾共同体。

六、结语

雷蒙德·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以情感结构为线索，揭示了城乡文学背后动态的社会经验以及复杂的阶级权力关系。在田园诗歌与城市小说的交织分析中，威廉斯让读者认识到在文化层面并无固定的意识形态，而是流动变化的情感结构充当中介作用。若将社会特征视为理想化的价值观，那么情感结构则是大众对现实普遍真实的体悟，可以说后者是对前者的巧妙修正和维护。他通过情感结构批判了城市进步主义与田园主义的二元对立，指出这种认知错位实则是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产物，乡村因此被塑造为怀旧的乌托邦，遮蔽着剥削与不平等的真实田园历史。

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并非完美，比如他对文化的定义以及何为整体的生活方式阐释含混，过分强调文化的作用可能使文学作品沦为一种仅供历史参照的社会档案，忽视文学本身的美，但“情感结构”的提出着实为文学批评开辟了一条动态化的阐释路径。对于《乡村与

城市》，威廉斯本人也承认其只聚焦英国传统城乡的单一和局限，但在结尾可见瑕不掩瑜：“为了能够进行讨论和修正；为了能够进行各种可能的合作；但最重要的是为了能够突显我们生活着的许多乡村和城市——突显对一种经历的感觉以及对改变该经历的各种方式的感觉”。再回过头来思索作品“献给我的祖父母，他们是乡村工人”的开篇，这也是威廉斯个人的情感结构，在对英国资本主义下城乡关系进行探索的同时也是个体对家庭、社会、历史的回望，是将文学文化批评根植于具体的人与生活经验的最佳诠释。

威廉斯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并未止步于解构，而是进一步将城乡关系置于动态的社会实践中，呼吁超越分工对立、探索新型合作的可能。这不仅为文化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工具，更指向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发展愿景，城乡不再是此消彼长的战场，而是相互合作的共同体。这一愿景的实现，或许正始于我们放下对“进步”与“落后”的执念，转而倾听土地与社群的真实呼吸。

参考文献

- [1] Blackburn, Robin. “Introduction in Raymond Williams, Resources of Hope: Culture, Democracy, Socialism” [J]. London and New York:Verso, 1989(01): IX.
- [2] Hall, Stuart. “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 [J].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980(01): 57-72.
- [3] Williams, Raymond. “Notes on British Marxism since 1945” [J], New Left Review, 1976(100): 87.
- [4] 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M].倪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 [5] Williams, Raymond. Politics and Letters: Interviews with New Left Review[M], London: Verso Books, 2015.
- [6] 雷蒙德·威廉斯.乡村与城市[M].韩子满、刘文、徐珊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 [7] Leavis, F. R., & Denys Thompson.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The Training of Critical Awareness[M].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4.
- [8] 何卫华.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与“希望的资源” [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 [9] 徐德林. “乡村与城市关系史书写:以情感结构为方法” [J].外国文学评论. 2016(04):60-77.
- [10]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M].王章辉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 [11]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M].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 [12] 冯昊,邵洪. “文化唯物主义的解构实践、方法论路径及意义——以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为中心” [J].天津社会科学.2025(02):133-141+166.
- [13] 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王尔勃、周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 [14] Williams, Raymond. Resources of Hope: Culture, Democracy, Socialism [M]. London: Verso Books, 1989.

Social Experience in Solution: On the Urban and Rural in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under the Structures of Feeling

Zhang Xuy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Province, 210000)

Abstract: As the core concept of Raymond Williams' cultural materialism, structures of feeling serve as a methodological bridge connecting individual experience and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In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Williams takes structures of feeling as a guide to explore th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in British pastoral poetry. He criticizes the cognitive disjunction between urban progressivism and pastoralism in traditional urban-rural writing, while revealing th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model under capitalism reflected in pastoral poetry and extending this model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ires and colonies. Finally, by deconstructing the solidified logic of urban-rural opposition, he re-examines the militancy in urban-rural interaction and the appeal to reject division of labor and seek new forms of cooperation. Structures of feeling not only breaks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urban-rural narratives, but also dissolves social experience from solidified ideologies, providing critical insights for addressing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ssu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Keywords: Raymond Williams;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Structures of feeling; Cultural materialism;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作者简介(可选):张续英, 东南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英美边疆文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